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现途径思想再探

汤姆·洛克莫尔/文 员俊雅/译 王 歌/校

〔摘 要〕马克思与古希腊哲学传统、特别是卢梭关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存在继承关系，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与扬弃私有财产有关。马克思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与无产阶级革命、利润率下降、无产阶级政党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等密切相关。

〔关键词〕马克思 卢梭 洛克 黑格尔 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712.7

无论如何，马克思都是一位巨人，是影响力遍及当代世界的思想家之一。重要思想家的声誉总是随时代而起伏。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马克思思想重新流行了起来，对马克思的关切也流行了起来。资本作为马克思关注的核心问题，引起了皮凯蒂的兴趣，皮凯蒂对资本的探讨也是他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上产生轰动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是19世纪的思想家，出生在几乎正好距今两个世纪以前，也恰好是受他巨大影响的“十月革命”之前一个世纪。青年马克思阐述了对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梦想，它的实现取决于一种非传统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但能解释而且能改变现代世界。马克思的梦想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其所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不是他心向往之的目的本身，而是一种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回答了古老的西方哲学对人类全面发展这一主题的关切。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现代工业社会没有也不能实现全面发展，但他确信，人作为完全实现的人类个体，则可以并且将会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之后，获得全面发展。然而，由于没能完全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论证中的重要部分，包括对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重要过渡的理解以及在未来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人类自由的确切性质，仍是需要探讨的。

本文关注以哲学的方法解析马克思，从三个部分讨论马克思的梦想。第一部分分析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指出我们必须通过马克思自己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第二部分探讨马克思与笔者称之为现代版的卢梭问题或者哲学关于人类全面发展的传统关切之间的关系，并举例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自由的概念。第三部分探讨马克思理论的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通过考察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有关主张，来研究它所具有的促成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能力。

一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试图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理念的诸种努力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通常非常重要，因此首先探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洛克关于应当清理灌木丛似的冗余观念的观点，也非常适用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清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并达到对马克思的理解，这只能使我们获益。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通过柏拉图主义者来解读柏拉图，也不能通过康德主义者来解读康德，与此同理，我们

也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者来解读马克思。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的实践则以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来解读马克思,结果创造了一个严丝合缝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一些马克思主义领袖似乎具有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言的权威。能够解释这种非同寻常的实践状况的原因包括:马克思著作的延迟出版;马克思与恩格斯具有长达四十多年亲密的个人友谊和思想关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而获得领导地位;斯大林排斥公开的不同意见;一大批具有共同政治关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理解马克思理论所展示的统一战线;等等。

关于马克思事实上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争论中普遍存在。在对马克思的讨论中,更多时候是接受或者拒绝一种或其他多种关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而不是关于马克思本人观点的解读。坊间流传的证据表明,马克思不赞同这种潮流。在回应保尔·拉法格时,据说马克思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毫无裂痕的连续性,这种主张在关于马克思的争论中普遍存在,而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否认了这一点。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之后,主要由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他的一系列著作,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主要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阐述了这些理论。在这些以及其他著作中,恩格斯对有关马克思的解释进行辩护,而这种解释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的误解之上的。曾经师从黑格尔的费尔巴哈,成了黑格尔的一位无足轻重的批评者,后来又成了一位重要的新教神学家。恩格斯的小册子所涉及的“终结”一词来自德国古典哲学,是恩格斯用于德国唯心主义的术语。和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恩格斯认为德国唯心主义在黑格尔这里达到了顶峰,并且被终结了。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的朋友和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也认为哲学已经终结了,他很多次写道“我们的哲学革命终结了,黑格尔画上了哲学的伟大圆圈。”^②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把黑格尔放在一边,转向了现存最伟大的哲学巨人费尔巴哈,马克思在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和哲学本身之后,转向了唯物主义和科学。

恩格斯通过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所作的解读,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关于马克思的这种解读的各种版本持续得到辩护。这种见解有三个基本的信条。第一,马克思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可与达尔文相比较的科学家。就像达尔文发现了生物学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马克思在黑格尔去世不久研究哲学,但是后来他摒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概念枷锁。唯心主义错误地从精神下降到物质世界,而唯物主义则正确地物质世界上升到精神。马克思放弃了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第三,马克思远离黑格尔、唯心主义和哲学,这主要是由于费尔巴哈的影响。

在关于马克思的争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阐释得到广泛接受,部分是因为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之上的制度化现象已经存在的时候,马克思的许多作品稍晚才得以出版,某些著作甚至更晚才出版。比如,列宁在创立列宁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主要以恩格斯为依据解释马克思。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中,列宁引用了恩格斯300多次,但仅仅引用了马克思一次。

黑格尔的思想在几十年中缓慢演化,马克思则是一个“善变”的思想家。19世纪40年代早期,当马克思开始探寻自己的思想道路时,他突然对费尔巴哈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也几乎同样突然地结束了。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借鉴了一种宗教观,直到后来他还继续坚持这种宗教观。费尔巴哈还影响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关于主体的概念。尽管马克思曾在某一段时间内受费尔巴哈影响,并且通过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87页。

^② Heinrich Hein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SUNY Press, 1986, p. 156.

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费希特的影响，但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其余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

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被几个局限性所削弱。第一，就知识背景和纯粹能力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差别。前者受过根据当时标准所进行的哲学训练，而后者没有受过哲学训练。当恩格斯还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就辍学到他家族的工厂工作时，他所知道的不过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中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第二，马克思著作的缓慢出版。在1895年去世之前，恩格斯编辑整理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但是，关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短篇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1927年才出现“巴黎手稿”开启了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但它1929年才在苏联出版，1932年在西方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939年才出版；不一而足。仅这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在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出版之前，那种关于马克思抛弃哲学转向了科学的观点，在很多情况下就已经存在了。第三，恩格斯诉诸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所谓的区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反对他所说的费尔巴哈和以往各种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思辨态度，而支持以社会活动或者他所说的“社会的人类”为基础的实践态度。马克思正确地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或者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即市民社会的所谓的未来哲学的基石，不过是换了版本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名字。那么，它表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有趣的是，这一点并没有被列宁^①或者卢卡奇^②所把握。

更进一步的理由与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因素有关，这种因素有时候似乎将哲学还原为政治学。柏拉图反对诡辩术，这导致他拒绝把较贫乏的论证视为似乎是更充分的论证。在哲学的政治性因素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度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基本不能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来把握马克思？对此，上述一系列原因表明：我们必须谨慎地确定什么能够接受，什么必须拒绝。那么，G. S. 琼斯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传记中所说的观点就不令人惊诧了。他说“二十世纪所建构出的马克思仅仅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有着偶然的联系。”^③

二 卢梭问题、文化与文明

马克思的核心关切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传统伦理学主题的现代变体。这个主题涉及一些相关的概念，比如，自然与教化、幸福、自我实现、人的发展等。这个论题和西方哲学传统一样古老。苏格拉底尽管没有使用那样的标题，但对此有所预见；柏拉图阐述了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此又有所论述，卢梭又在现代社会作了重新阐释，这就是笔者要说的卢梭问题。卢梭提出了这个关键问题：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或者在何种社会，人类能够全面发展？如果社会存在发展差别的话，人类怎样能够发展得最好？

这个主题产生自古希腊哲学，贯穿于整个现代哲学传统。很明显，它涵盖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显然，在约翰·罗尔斯之后，我们当前有可能处于一种偏离——远离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走向了一个较为狭隘、不那么有趣的问题，即关于正义的问题；然而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理想的城邦中的正义，而是对现代个体而言的正义。^④

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领域非常宽广，包括宗教、医学、社会学、哲学等。幸福、自主或自足、美德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23页。

②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MIT Press, 1971, p. 33.

③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Penguin, 2016, p. 594.

④ 这个比较狭隘的问题，比关于自然和人类全面发展的条件这一传统的、更宽泛的问题更加狭隘的问题，使后来的一些批判理论家，包括哈贝马斯、霍耐特和更晚时期的耶吉，都有兴趣。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Suhrkamp, 2014.

或德性出众、健康、福祉、全面发展等，诸如此类的概念都包含在其中。在基督教中，人的全面发展基于从堕落中获得拯救。对各种流派的基督教来说，这种方法总是围绕着有限的人类与无限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展开，奥古斯丁将其描述为从雅典到耶路撒冷的回归。另一种方法是将文化和文明理解为人类的建构，简言之，就是人与自身的一系列直接关系。

人类在自然中产生时建构了文化，也建构了文明。自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普遍相信，人类是社会动物，他们天然生活在不同类型的群体中，这些群体包括古希腊城邦、后来的城市 and 现代国家。众多形式的城市对人类来说有一种特殊作用，就是作为生活场所使人们得以生存、更好地生活、生活完满。人类自己建构的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很久以来就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讨论日程表中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回应这个问题的较早尝试，他理性地设计了一个城邦国家，那时城市和国家还没有分离。在现代传统中，主要的关切让位于对自由的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术语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问题本身也改变了。在现代，人的全面发展被亚当·斯密、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理解为自决^①或人的发展等不同含义。

1. 卢梭问题的挑战

柏拉图认为人类具有固定的本性，因此也具有固定的社会功能，这是他解决人类在理想城邦—国家中全面发展问题的基础。^② 在现代社会，卢梭和其他人质疑了柏拉图这个设想。柏拉图关于人类和社会环境之间稳定关系的设想，被卢梭转变成了现代社会境况中的自由问题。

在 17 世纪，霍布斯关注的问题是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捍卫生命，而用他的著名论断说这种生命是“污秽、野蛮和短暂”^③ 的。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在 18 世纪，卢梭给出了一个同样著名的论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④ 他达成了缔结社会契约的目标，不仅仅是生命本身，而且是自由的一种更有意义的形式：在社会境况中，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核心形式是自由。

人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卢梭在 18 世纪中期所提出的挑战。康德从一种显而易见的亚里士多德视角，用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来描述卢梭问题。康德认为，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和其他著作中，试图解决如下更困难的问题：文化必须如何进展，以便使作为一个道德物种的人类的禀赋得到与其规定相应的发展，使得道德物种的人类不再与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类相抵触。从这种抵触中……产生一切压迫人的生活的真正灾祸和一切玷污人的生活的恶习”^⑤。他的遗稿增加了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某种早期生态视角。在康德看来，人类必须为“道德和幸福的一致”而努力奋斗，不是在控制自然而是在促进自然的繁荣中，达到这种“德福一致”的顶峰。^⑥ 其他理论家，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卢梭的挑战视为有关文明的问题。

2. 财产、私有财产和人类全面发展

关于财产或者私有财产的讨论很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城邦守护者既不能有

① 在题记中，穆勒引用威廉·冯·洪堡的话“本书所展开的每一个论证，都直接指向一个总体的首要原则：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② James Tabery, *Beyond Versus: The Struggle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of Nature and Nurture*, MIT Press, 2014.

③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Richard Tuc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9.

④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4页。

⑤ 《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119页。

⑥ Kant, “Handschriftlicher Nachlass”,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Deutsche/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 Gruyter, Vol. XV, Teil. 2.

金银,也不能有私有财产。^①柏拉图是这种(财产)制度的批判者。但亚里士多德则是财产权的隐秘的捍卫者:他赞同将所有权视为服务共同福祉的最好方式^②,他讨论了获取财产的合法途径^③,反对将财产视为不正义而加以剥夺。^④

在现代哲学讨论中,对洛克、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和其他相关理论家来说,财产以不同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人传承洛克,将私有财产理解为土地所有权。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理解与这些人不同,他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包括土地和其他东西在内的生产方式的私有权。卢梭批判但并不反对私有财产权,尽管他的观点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抨击了私有财产权。但是在给《百科全书》写的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中,他将私有财产权描述得甚至比自由还要重要。另外,他还指出财产权影响它触及的每个事物,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承认劳动能保护人以及与其相关的财产。^⑤

对财产权制度的辩护已经出现了很多。^⑥马克思拒斥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种制度本身,青睐超越了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共产主义。它的合法性在于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贡献。马克思的目标不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在后工业社会实现人类自由的重要手段。马克思认为,如果人类自由是可能的,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即私有财产的缺席不是例外而是规则。

现代社会似乎有两种主要的论证财产制度的方式,即用人类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以自然权利来表达的相关形式。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认为财产来自盗窃,马克思也接受这种观点。但上述两种辩护都认为,财产并不出自盗窃,而是赚得的。

劳动价值论和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私有财产的合法获取的观点,都要归功于洛克的预见。其基本洞见是,无论如何,因为个人的身体是自己的,个体就能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洛克认为,“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是正当地属于他的”^⑦。在洛克看来,劳动创造价值。他写道“因为正是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⑧。“由此可见,虽然自然的东西是给人共有的,然而人……本身就具有财产的基本基础。”^⑨他还在许多地方声称,一个人将劳动作用于自然,他就正当地使它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这里仅列举一处说明这点就足够了:“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⑩

价值通过劳动得以创造,属于或者至少应当属于(付出劳动的)个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赞同洛克。但是他否认个体劳动者或者其他任何人可以合理合法地获得私有财产。然而,马克思也没有论证私有财产的获取是非法的。进一步说,他的观点似乎并非一以贯之。如果工人应该拥有劳动成果,如果正如洛克所言的劳动和自然相混合,劳动结果就应当属于工人。的确如此,除非人们持这样的立场(正如一些宗教思想家所坚持的那样),即自然不能属于任何人类个体,而属于上帝。

3. 黑格尔、财产和承认

人类能够在现代社会实现全面发展,黑格尔给这个结论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论证。在黑格尔看来,既

① Plato, *Republic* 417A,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 1052.

② Richard Kraut, *Aristotle: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47.

③ E. D. Miller, *Nature, Justice and Rights in Aristotle's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28.

④ Aristotle, *Politic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I, Jonathan Barnes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8—61.

⑤ Christopher Pierson, *Just Property*, Vol. II: *Enlighte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68.

⑥ Christopher Pierson, *Just Property*, Vol. I: *Wealth, Virtue, and th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⑦⑧⑨⑩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8页;第26页;第28页;第18页。

然人类活动就内在本性来说是理性的，现代国家就是一个“内在理性的实体”^①。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盲目赞赏所有形式的国家；也并没有证据表明，他赞赏普鲁士改革之后他所处时代的国家。这种批评被黑格尔同时代的许多人提出来，以反对《法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也经常提出这种批评，不过都缺乏足够的文本依据。

黑格尔认为，人类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如对立、尖锐对立、非对立，在最好的条件下能够相互承认，爱就是这种承认的最有意义的形式。根据所采取的形式，相互承认所导向的方向有所不同。有一种形式是，由于意识到个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中的作用，从而释放出深度破坏力。这就是阶级意识，卢卡奇将其视为马克思理解现代工业社会的核心要素。^② 这种离心力没有维护现代国家的稳定，相反却动摇了它，成为许多争取自由的社会运动的根源。另一种形式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自我认同。这取决于多种结构的存在，这些结构使个体在现代社会有可能发现自身。承认，伴随着阶级意识，并且在最高水平上伴随着自我意识。现代社会建制和现代国家框架内的实践，构成承认的中介。

我们可以通过黑格尔关于人的活动和相互承认理论，来重构其论证。^③ 后者包括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个体在国家中对自身的承认。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现代国家时，黑格尔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承认理论。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上的承认，都要求两种因素之间的某种关系。不同的是，在前一种状况中，个体寻求另一个个体的承认，通过这个个体他开始了解自身。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体在国家中发现和认识自身。这包括对多种权利比如黑格尔将其视为现代国家形式的基础的私有财产权、人作为人的地位的法律认同，甚至还包括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合法认同。

毫无疑问，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充满兴趣。人的全面发展主题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贯穿于西方整个哲学传统，马克思的核心关切就是这个古代问题的现代形式。在古希腊哲学中，人的全面发展和德性出众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哲学家对此都有所论述。现代工业国家的兴起，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从古希腊所主张的美德或德性出众，转变为自由个体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发展的能力。从霍布斯到卢梭其间出现了工业革命。当工业革命逐渐在现代世界发生时，卢梭呼吁关注人类自由的独特性质和真实可能性。工业革命带来了变革，在这种变革中，自卢梭以来，人类全面发展的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同实例中，表现为人类自由。这个主题不但吸引了卢梭，而且还有后来的思想家诸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

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自由概念将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对此马克思给予了许多论述。这里列举其中四种，它们包括：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段落《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另一个段落；以及从他的遗稿中发现的《资本论》第3卷的一个段落。（1）在对穆勒的评论中，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我们每个人都确证着其他人。^④（2）《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被广泛引用的段落，马克思说道在未来社会中，一个人可以打猎、捕鱼、从事批判，而不必局限于其中任何一种活动。^⑤ 尽管这段话被广泛引用，但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使它无论被视为两位作者中任何一人的观点来源都十分可疑。（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个段落中，马克思拒斥了劳动分工。^⑥（4）在《资本论》第3卷

① 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H. B. Nisbet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

②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p. 46—82.

③ Robert R. Williams, *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6—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79—480页。

一个段落中，马克思评估了缩短工作日的益处。^① 马克思主张缩短工作日，此时，马克思似乎从革命转向了改革。

三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至此，笔者勾勒了所谓的马克思的问题，以及他对作为现实目标的人类自由的各种阐释。现在所剩的问题是追问马克思，为了解释世界尤其是改变世界，如何思考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从马克思全部著作中，我们可以辨识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和无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批判理论有关。

第一种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的一篇关于黑格尔的早期文章中，马克思以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指出，无产阶级是心脏，哲学家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脑。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不能为自身思考”的柏拉图式的观点，植根于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的观点：据说有时候，奴隶是主人的主人，而主人则是奴隶的奴隶。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有很强的理论性。马克思所想象的那种无产阶级，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出现过，或者如果后来它确实出现了，也仍然消失在历史当中。这种观点是合理的。马克思后来再没有回到他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心脏”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被列宁改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先锋队，并且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胜利的核心”。

马克思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替代的、非规范的经济模式，意在指出一种独立于无产阶级、但内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革命时刻。古典政治经济学坚持的观点是，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因素服从于周期性的危机，但从长远来看，在整体上则是稳定的。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代工业社会在短期和中期内服从于周期性的危机，从长远来看则是不稳定的；具有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最终会面临难以解决的危机，这种危机将会“炸毁”它的“外壳”。在一个著名的段落里，马克思写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

第二种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崩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理论以三种机制为基础：生产过度和消费不足（其实这是同一主张的两种不同说法）以及被马克思称为规律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个假设，马克思从来没有更多地加以阐释。另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求增加投资，一段时间后这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没有阐述更多。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一个被包括亚当·斯密、J. S. 穆勒、大卫·李嘉图等19世纪思想家所接受的假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这个假定的规律描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③，并且他在遗稿《资本论》第3卷第13章中对此有所论述，但是不够细致。在《资本论》中论述自己的理论时，马克思作出了一个简单而抽象又不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论证，即资本的不断积累导致剩余价值减少，并因此带来利润率的普遍下降。然而，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可信的经济证据支持这个论断。

在理论层面，这个假定的规律最近又被托马斯·皮凯蒂的重要研究成果《21世纪资本论》所反对。皮凯蒂的核心主题是“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样一来，过去积累的财富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926—9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8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8页。

远比未来的收入所得重要得多。”^① 皮凯蒂也许是策略性地声称自己没有读过马克思，并指出没有经济证据证明利润率下降，因此，推而广之，也没有证据证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自我崩溃。这和一个多世纪前克罗齐的看法相一致。克罗齐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详细论证他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他没有看到：恰恰是增加了更多投资，而不是降低了利润。^②

代替资本主义的第三条政治学道路主要是政党理论揭示的，就是通过党的革命先锋队作用，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机制，是批判（社会）理论。黑格尔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批判理论试图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应用于德国和苏联治理下的变化了的社会状况。在社会批判理论中，这个诉求至少从三个方面被削弱了。首先，波洛克认为政治不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则是由政治决定的。其次，批判理论存在着从社会经济维度的脱离，因而是一种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变化的动力概念的脱离。这在哈贝马斯那里非常明显，而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那里就已经很清晰了。最后，马克思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回到康德的观点时存在一种断裂。康德认为，实践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于同一种理论。这种新康德主义在双重意义上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没有理由认为，如果两个或更多个体关于某种主张达成一致时，它就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共识本身并不促成社会变化，就这方面而言，它和马克思试图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努力并没有关系。

总之，马克思阐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替代理论的目的，像诸多哲学理论一样，本身显然不是目的。相反，几乎从任何标准来看，它都是一种试图实现有限人类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类个体的能力的普罗米修斯式努力，试图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方式来解决、消解或者攻克卢梭式的问题。马克思假设的人类状况在现代世界的转变，就其实现而言，取决于他所假定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这个例子中，关于实践的理论 and 关于理论的实践，如果两者可以统一的话，将会带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从理论上说，这会带来理想社会的实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译者及校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强乃社

^① 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 590 页。

^② Benedetto Cro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C. M. Meredith (trans.), 1914, rp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1.